

以保护环境为名发展经济：以天鹅洲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张家炎
肯尼索州立大学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ame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Rural China:
The Case of the Swan Islet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Jiayan Zhang
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

摘要

天鹅洲位于长江中游湖北石首境内的长江故道内，初为放养原产中国的麋鹿、白鱃豚而设。为保护这些珍稀动物，地方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建设，如修堤减少洪水威胁。这样不少以前的荒滩变成可垦地、同时麋鹿种群的繁衍又要更多的地盘；而禁渔也影响当地渔民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保护区与农渔民之间，保护区与政府有关部门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随着保护湿地呼声的加强与生态旅游的兴起，当地政府又加上湿地保护的内容、并以此为由向上级政府申请经费；同时以观赏麋鹿及湿地生态为名重点推介、发展旅游事业，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关键词

经济发展、自然保护区、天鹅洲、江汉平原

Abstract

Swan Islet, located in the old course of the Yangzi River in Shishou, Hubei, central China, was chosen as a nature reserve first to conserve milu 麋鹿 (Père David's deer) in 1987 and white-fin dolphins 白鱃豚 in 1992.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n built dikes to protect this area from the annual high water of the Yangzi River, which turn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riverside wasteland into reclaimable land attractive to the local farmers. At the same time, more land was needed to feed the fast-growing herds of milu. In the river, dolphins and fisherfolk compete for resources. Different interests have caused conflic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farmers, and fisherfolk. Conflicts between governmental bureaus has made things even more complicated. With the increasing appeal of wetland preserv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added wetland preservation to its agenda and applied for financial support from upper-level governments. Attempting to lure tourists with milu—a “national treasure”—and original wetlands,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hoping to promote eco-tourism and eventually to boost local economic growth, all in the name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Key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ure reserve, Swan Islet, Jianghan Plain

鸣谢

很多人——特别是天鹅洲麋鹿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为此文的写作提供了材料，对他们的慷慨相助深表感谢。所有错误由作者负责。

中国自 1979 年经济改革以来因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恶化、特别是农村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众所周知，并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有人认为这种环境恶化源自共和国初期“毛对自然的战争”（Shapiro 2001）。不可否认，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以牺牲环境的代价发展经济。但为生存而与自然相争在中国农村并非新鲜事。如为保护耕地不受江河年度洪水的威胁及开垦土地以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水多地区如华中湖北江汉平原几个世纪以来就不断修筑堤防（张家炎 2016）。这一传统延续至集体化时期，当时更多的河滨、湖泊被围垦成田，部分是由于江河湖泊被收归国有及国家权力深深地渗入农村社会。结果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江汉地区有 150 座面积 5000 亩以上的湖泊消失（湖北水利志 2000：137-48）。

这种垦殖的副作用显而易见，包括减少洪水蓄泄的空间、加大堤防的防洪压力、减少物种种类、以及缩小湿地面积等。就全国而言，“开垦是湿地丧失的主要原因”（An et al 2007: 338）。但耕种这些新垦地中的某些田块因其地下水水位高而经济效益低（产量低、排涝成本高），因此不少地方人们在 1980 年代时开始退田还湖。

集体化时期发展农业是乡村干部的主要目标，而土地开垦是发展农业的一种主要方法。高度中央化的政府也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人开垦河滩、湖泊。1979 年以后耕地重新返回给各农户耕种，但多数年轻村民对务农不再有兴趣，他们涌向沿海、城镇寻找非农工作。另外，地方干部的主要目标也转向发展经济——通常指寻求外来投资与发展工业（更准确地说是制造业），而非通过开垦土地扩展农业。

认识到过度围垦湖泊的严重性、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政府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如退田还湖、退耕还牧还林，以及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包括湿地保护区。虽然中国直到 1980 年代才开始大规模建立自然保护区，但其自然保护区增长很快，早在 2003 年底时中国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例已经超过世界上除北美、中美洲以外的所有地区（李小云等 2006：10-11）。然而，与西方自然保护区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然环境本身不同，在中国（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设立自然保护区同时还要考虑当地老百姓的生存福祉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当地政府来说，这些可能是更重要的考虑。

至 2010 年末，中国经济按 GDP 衡量在总量上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此乃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但中国仍有五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不少农民仍在为基本的生存努力；而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多设在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王恺 2003：3），因此自然保护区的发展与当地农民的生存福祉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各级政府为保护这些保护区所制定的政策、所采取的措施及国家涉农政策的宏观调整都会在农民方面起到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而当地方政府把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联系起来之后事情就更远比单纯的保护自然复杂得多。湖北石首天鹅洲自然保护区人与动物之争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就是时下中国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争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人与环境互动大背景下的一个生动例子。

天鹅洲的地理位置与保护区的由来

天鹅洲位于湖北省石首市天鹅洲长江故道区，地处长江中游下荆江河段北岸、江汉平原南端。1972 年以前天鹅洲三面环江，洲上有六合垸，垸内有湖泊、沼泽与农地；垸外则由洲滩围绕。1972 年夏长江在此地自然改道，六合垸变成由长江故道与长江新水道四面环绕的江中岛。天鹅洲湿地因此既包括有长江故道、湖汊、洲滩、沼泽、池塘等自然湿地，也包括有农田、沟渠等人工湿地。该湿地总面积 68.7 平方公里，含水域面积 19 平方公里；有 40 公里外围边滩及 20.9 公里长的长江故道；其中心则是天鹅洲（朱江 2005：58-60、75）。这是长江中下游保存最为完好的湿地，已被列入中国重要湿地名录（石首旅游 2007，7：8）。

天鹅洲有两处自然保护区。第一处是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与天鹅洲故道的交界处，有湿地 1,567 公顷（简报 2008，1：封二）或 23,505 亩。该保护区土壤肥沃、牧草丰盛——其植物包括 161 属 220 种（其中 100 种以上是麋鹿食料）（曹克清 2005：111）。区内同时有

陆生脊椎动物 231 种，包括 8 种一级、18 种二级国家重点保护稀有动物（朱江 2005：60-61）。因保护区洲滩广阔、食料丰富，每年会有总数多达 20 万只以上的候鸟在此栖息，它们分属 18 目、47 科、119 种（石首旅游 2007，7：25）。

麋鹿二三百萬年前原产于中国并曾广布全国，包括湖北。野生麋鹿约在二十世纪之交绝迹，环境变化（气候变冷）、麋鹿的食物偏好（它们只吃部分植物）及人类活动（主要是过度猎杀与过度开垦）都是原因（夏经世 2005：16-17、丁玉华 2004：1-3）。最后仅有少数圈养麋鹿幸存于北京的皇家猎苑（南苑）。1900 年，八国联军（英、法、德、美、日、俄、意、奥匈）入侵、劫掠北京，南苑里的麋鹿被全部杀光，麋鹿在中国本土绝迹。中国以外，世界上（二战前）也仅有一小群麋鹿生活在英国的乌邦寺，现在的麋鹿都是它们的后代（郭耕 2005：4；曹克清 2005：9-11）。

1985 年 8 月 24 日，当时的乌邦寺主将 22 头麋鹿赠给中国，其中的 20 头放回南海子麋鹿苑（清皇家猎苑旧址）、另 2 头送上海（郭耕 2005：4）。南海子麋鹿苑内的部分麋鹿随即被送到几处外地放养，包括天鹅洲。学者们认为天鹅洲是野生麋鹿的最佳栖息地之一，因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均表明麋鹿曾在江汉平原及邻近地区生息达数十万年之久（曹克清 2005：25，111；丁玉华 2004：23-24）。

石首天鹅洲麋鹿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1987 年，1991 年升级为湖北省的省级自然保护区，1998 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其他自然保护区旨在保护保护区内现存的生命不同，天鹅洲麋鹿自然保护区的目的是为了把已从野外灭绝的麋鹿重新引进到它原来生活的自然栖息地中重建其自然种群（亦即为实现麋鹿回归自然而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天鹅洲保护区在 1993、1994 年分两批从北京引入麋鹿 64 头，由于保护区内自然环境非常适合麋鹿的生存和繁衍，加之麋鹿可食性植物种类繁多，麋鹿种群迅速发展并形成三个亚种群。保护区不仅实现了麋鹿自然放养的目标、而且结束了中国没有野生麋鹿种群的漫长历史（石首旅游 2007，7：12-13；简报 2008，1：封二）。

天鹅洲的第二处自然保护区是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鱓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包括（石首段）89 公里长江及天鹅洲 20.9 公里长江故道，总水面面积从 14.66 平方公里（冬天）至 26.66 平方公里（夏天）不等。1999 年以前，故道在每年 5 月至 9 月间（汛期）与长江连通，互换水与资源。故道内水质优良、饵料丰富，使其成为蓄养、保护白鱓豚的理想地点。该保护区 1992 年正式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恺 2003：609；石首旅游 2007，7：20；石首市志 2014：6）。

白鱓豚是属于中国特有的珍稀水生哺乳动物，又称“水中大熊猫”或“长江女神”（石首旅游 2007，7：21）。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野生的白鱓豚数目急剧减少，从 1984 年的约 400 头降至 1995 年的 100 头以下。保护区内唯一的一头白鱓豚 1996 年因伤致病死亡，之后再没有放入新的白鱓豚。现在保护区水中放养的实际上是江豚，江豚并非濒危物种，但其数目也越来越少，从 1993 年的约 2,700 头降至 2006 年时的约 1,000 头。过度捕捞、水体污染、修坝建闸、航运（大小船只的螺旋桨）等均威胁到白鱓豚与江豚的生存、并导致他们的数目减少（佚名 2006a；王丁、王克雄 2008：23、68-69）。

为加强对保护区的管理，石首市政府于 1999 年成立天鹅洲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管辖两个自然保护区、一个渔场、六个自然村，全区 2005 年时有 2,633 户、11,594 人，耕地 846.6 公顷（或 12,699 亩），经济以农业为主（石首市志 2014：34、49-50）。

保护区内的利益博弈

天鹅洲一地相继建成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们慢慢开始关注这个地方。随着麋鹿种群的增加与江豚的成功放养，越来越多的新闻被登在报纸上，大量的讨论出现在互联网博客中。某些科研机构如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长江大学在天鹅洲建立科研基地及来自某些大型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投资也将外部影响带入保护区，当地政府则努力争取上级政府投资、以生态旅游的形式刺激地方经济增长。

当地居民，不管是农民还是渔民，却有不同的考虑。他们多认为保护濒危物种、保护湿地远不如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重要。另外，潜在的科研价值和生态旅游对他们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如何提高他们自己的收入一直是更为现实与迫切的考虑。结果，随着当地政府为保护区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导致的务农条件的变化及国家宏观农业政策的改变，当地农民与保护区的冲突越来越多；政府各单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土地的使用有不同的优先考虑，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保护区存在几个问题。首先是各方争地。芦苇曾沿长江广泛生长¹。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天鹅洲地区的大量洲滩被围垦成农田或用作其他用途，芦苇面积急剧减少，但近几十年来速生丰产工业原料树（用于造纸）意杨的面积却不断扩大。

1998年江汉地区及全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直接影响到天鹅洲保护区内麋鹿的生存环境（有些麋鹿逃走）。部分为了保护保护区免受未来洪水的侵袭，地方政府在天鹅洲长江故道与长江现河道之间修筑大堤²，切断了两者的天然联系，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例如此堤的修筑减少了长江年度洪水的威胁，因而不断有滩涂（汛期淹没、水退裸露）露出来并随即被当地农民开垦出来种意杨、或围起来养螃蟹（近年来需求大的一种商业性水产品）。一份材料指出白鬃豚自然保护区原有滩涂面积 2.8 万亩，2005 年底只剩下 3000 亩。麋鹿保护区也不断被蚕食，蚕食者可能是芦苇局（它围了数千亩地种芦苇）、也可能是当地农民（他们圈地植棉）。结果，原来划给天鹅洲麋鹿保护区的土地，真正由保护区控制的面积不足 2,000 亩，留给麋鹿的土地越来越少（张孺海、陈勇 2006）。

然而在大堤修筑之前，大多数当地人曾认为上述滩涂毫无价值，因它们一年之中的多半时间都浸泡在大水之下，只有某些无畏的农民才会在滩涂上种些作物，一年最多收一季。所以有谁愿意承包很容易。而且那个时候因农产品价格低、各种税费多，大多数农民连正规农田都不愿意种、更别说种滩涂了；很多年轻村民外出沿海、城镇打工而让其农田抛荒、或租给别人种意杨（吴学军 2005）。

2004 年初，中央政府决定减免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湖北于 2005 年全部取消农业税。这一新政策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在天鹅洲地区，它立即改变了当地农民对耕地及种地的看法，总体上讲他们种地激情增加，不仅种自己的责任田、也开始开垦滩涂种棉花、栽意杨。对这些村民来说，他们祖辈世居于此，这些滩涂当然是他们的（吴学军 2005）。然而他们的行为不仅破坏湿地生态系统、也减少麋鹿生存面积。

其次是人豚争鱼。最初设立白鬃豚自然保护区时并未解决好当地渔民的生计问题，因此无法阻止他们在保护区水域内进行渔业生产活动，从而形成人豚争鱼局面（王恺 2003：616）。即使在修建隔开故道与长江的大堤之前，由于当地渔民传统上只捕不养，也由于长江鱼类资源整体减少（应该是由过度捕捞所引起）的影响，天鹅洲长江故道的渔业生产资源减少、渔业产量下降已很明显。1998 年大堤建成后情况变得更糟，天鹅洲长江故道与长江的联系被截断，两者仅靠一个闸门联通，大大限制故道与长江间水的循环，从而降低故道内的水质。所有这些变化都不利诸种水生生物的繁衍和生长。同时，天鹅洲长江故道水位也从 34.5 米降至 32 米、渔民继续只捕捞而不投放鱼苗、以及江豚数目不断增加（江豚主食鱼类且食量很大），渔民的捕获量与捕获种类均进一步大大减少（朱江 2005：77-78；张孺海、陈勇 2006）。

保护区资金短缺更使情况恶化。当时保护区主要依赖三项财政支持：地方政府拨款、农业部特殊补贴、长江故道渔业收入。然而随着保护区员工增加，经费渐渐入不敷出，但保护区无钱无法运行。为解决此问题、以及滩涂越来越少，保护区管理方也曾养螃蟹创收，但这种做法对故道湿地生态有害。他们知道这些，但没有经费，自然保护无法进行（吴学军 2005）。

¹ 沿长江洲滩特别适宜芦苇生长（石首市志 2014：65），而石首则以江边洲滩上有大量芦地闻名。

² 此堤共长 6.2 公里。至 2005 年，国家在此堤防及相应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超过 3000 万元（荆州市志 2015：213）。

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平衡生存与发展，也是中国类似保护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李小云等 2006：7）。化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厘清土地权属、解决经费短缺（王恺 2003：10-11），归根结底是一个“钱”字。相对于涉及到种族、文化、或边界纠纷等更加复杂的问题，钱的问题其实相对比较简单、比较好解决。有关方面采取的措施重点自然也放在解决财政问题上。

首先是将部分居民（主要是渔民，也包括一些农民）搬出保护区。考虑到保护区长江故道内的渔业资源越来越少，渔民的捕捞活动又严重影响到江豚的繁衍生息，石首市政府在 2003 年开始将保护区内的渔民搬迁、转产。世界自然基金会亦投入资金帮助渔民转产，主要是务农（陈勇、朱江 2006；石首市志 2014：98）。一份材料指出，自 2007 年起住在麋鹿保护区内的农民已有 1,109 人与政府签定了出让其 3,200 多亩棉地的协定，政府在麋鹿保护区外分配给他们同样面积的耕地（晓立、张利、姜晓晓 2014：73）。

其次是重建原生生态，即让长江故道与长江联通。修建大堤旨在为保护区防洪，保护区是被保护住了，但没有与长江活水的自然流通，保护区内湿地生境对麋鹿种群不利；故道与长江水通过闸门的偶尔交换也大大限制了两两者之间的物质交换，故道内水质相应逐渐恶化。故道水位稳定也导致两个保护区之间的冲突，因两者要求不同的水位；而在大堤修建之前，水位随季节涨落，两者间并无矛盾。于是，管理部门在 2004 年夏天开始定时适当开启闸门，让故道水与长江水进行循环（新京报 2004/7/1）。近年来，白鱄豚保护区更是采取了不少措施—包括投放鱼苗、移植水草、及在浅水区播撒草籽等—以“修复”生态（石首年鉴 2018：135）。

再次是清除保护区内的意杨林。2007 年元月，属市芦苇局管辖的某意杨公司在麋鹿保护区核心区域扩种意杨，此事不但影响到麋鹿的生存环境、也引起湖北省政府的注意。3 月，省政府派调查组前往麋鹿保护区调查，命令立即清除当年种植的意杨，共 16.5 万株。5 月，省政府召集相关各方代表开会协商，要求他们彻底解决当地的人鹿争地问题，以确保麋鹿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陈勇 2007）。

第四是理顺产权。2008 年林业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笔者，麋鹿保护区内的不少土地原本就属于芦苇局、林业局³，它们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种芦苇、栽意杨本无可厚非，且当时谁也不知道麋鹿会繁殖得如此其快。麋鹿多了之后，地不够了。有记者不知真相，报导说是芦苇局、林业局、自然保护区与当地农民争地。他们的报导在报纸上发表之后引起上级政府重视，湖北一位副省长来到石首协调各方解决此事，最后省政府拿出一大笔钱、划清了各自的界线。

地方政府采取的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方法则是发展旅游。

自然保护与旅游经济

当上述冲突出现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随之呈现：是麋鹿更重要还是人更重要？这是不少保护区面临的两难困境。天鹅洲保护区设在人口稠密的地方，自然资源压力大。当地老百姓认识到麋鹿是国宝，但他们的生计也不应被忽视；湿地生态需要保护，但他们也要谋生。他们认为保护国宝、保护环境是应该由国家负责的事，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牺牲（吴学军 2005）。虽然政府在不断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但也很难完全满足所有保护区的财政需求，保护区管理当局也必须想办法自己解决问题，发展湿地生态旅游就是其中的方法之一。

发展生态旅游并不仅仅只是保护区的目的，地方政府也将其视为主要的经济战略之一。如同当今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一样，石首市政府也竭尽全力寻找一切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早在 1994 年，石首市政府就曾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到石首为此出谋划策。这些人建议说，因石首没有大型的中央国企，明智的办法是利用当地的两件国宝（麋鹿与白鱄豚）扩大名声、争取外来投资（石首市志 2014：761-63）。同年，湖北一位副省长对石首的干部们说，天鹅洲保护区的综合效益要强

³ 这些地并不真正“属于”任何局，它们属于国家、但是由各局管理。至 2005 年，石首仍有 2833 公顷或 42495 亩国有洲滩芦地，由芦苇局管理（石首市志 2014：208）。

于（在此建）一百家工厂（戴居华 1997：182）。石首市政府听从他们的建议并采取行动，试图将麋鹿保护区的盛名转化为经济利益。2006年天鹅洲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之一，随后国家又授予石首“中国麋鹿之乡”称号（石首旅游 2007，7：10），这些举措使得保护区与石首均声名远播。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将经济战略的重点从东部沿海的发展移到中部发展，石首与天鹅洲自然保护区都在中部。因此石首政府要求保护区管理部门抓住机遇，以旅游为重点，争投资，争取社会各界与各级政府的支持（佚名 2006b）。

2001年，石首市政府决定将旅游作为一个战略目标、以为繁荣石首铺平道路，2005年将天鹅洲旅游列为石首旅游的三大支柱之一（石首市志 2014：320-25）。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要将天鹅洲保护区旅游作为石首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为达此目标，地方政府修建公路改善交通、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播麋鹿保护区的名声。如与《湖北画报》社合作出版《石首旅游》专册（2007年第7期），装饰封面的即是“中国麋鹿之乡——石首”的大字标题、及一群可爱国宝麋鹿的画面。在石首的宾馆房间里还放有一张石首一日游的传单，天鹅洲湿地是其中六个一日游的景点之一。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政府促进地方旅游计划的一部分（简报 2008，1：4）。现有不少栩栩如生的麋鹿雕塑装饰石首城关绣林镇，在麋鹿保护区办公区内还建有湿地中心暨麋鹿博物馆，其多媒体设施与标准的美国大学教室没有多大差别。其投资可观。

近几十年来，随着人们收入特别是可支配个人收入的增加，旅游已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及不少中国人——特别是城里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同时，中国法定公众假日不断增加并被有意安排在一起形成所谓的“长假”——多日连在一起。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旅游。如果天鹅洲保护区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吸引足够的游客，这将是一个自然保护、经济开发两不误的理想成功案例。

天鹅洲麋鹿保护区生态旅游在 2008 年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正式启动（简报 2008，1：15、封三）。从理论上讲，络绎不绝的游客不仅有利于立马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向外传播保护区的名声，从而为保护区带来更多的游客与外部资源、促进其发展的良性循环。⁴

天鹅洲自然保护区案例的重要意义

如前面讨论的那样，天鹅洲地区的滩涂传统上乃荒洲、易被水、不适合农作，所以就多荒在那儿。当建立保护区之后，特别是 1998 年大水时有麋鹿逃出保护区，地方政府为了防止麋鹿再度逃走、也为了防洪而修建堤坝挡水。此堤的修建却将以前的荒芜江滩变成了适宜种棉的可耕地。

尽管如此，2005 年以前当地农民与保护区的争地矛盾还不十分突出，因为当时种田还要交各种各样的税费，大大影响纯收入，青壮年农民都外出打工去了。但 2005 年及以后的税改将有些农民带回土地，因他们不用再缴农业税，碰巧当时棉花价格又高，除去种子、化肥、农药等投入，农民收入可观。但他们的耕地有限，于是不少农民转向保护区内的耕地或滩涂，从而形成农民（其优先是种作物）与保护区（要确保喂饱麋鹿）之间的剧烈冲突。同时，保护区土地所有权属又不太清楚，林业局要栽培速生杨为其合伙所有的、生产木材制品的工厂提供原材料；芦苇局则更愿种植芦苇、同时也栽意杨；在长江故道水面中则存在渔民与江豚争鱼的情况。也就是说，保护区内存在各种尖锐的冲突与竞争。

随着世界自然基金会、中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及长江大学的介入，更多的外部各方也参与博弈。保护区、林业局、芦苇局、村民均代表当地各种利益，外部金融、科研机构又激发了外部利益与当地利益的冲突。这些外部机构更着眼于保护湿地环境与其生物种群或其科研价值，他们对发展当地经济既无直接的动力、也无任何压力。与此相反，当地政府不仅有发展经济的直接动力、也面临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此地行政单位的名称就是天鹅洲经济开发区，它将保护麋鹿、白暨豚（以及江豚）、湿地生态作为巨大的机会争取外部财力支持，促进旅游，并最终为地

⁴ 虽然游客可以通过栅栏观看徜徉在保护区内的麋鹿，保护区目前暂未对公众开放。一般认为保护区不久就会对公众开放，特别是毗邻的石首长江大桥 2019 年 10 月通车之后更是如此，这使去到保护区更为便利。

方带来经济利益。地方政府会、而且确实已经想方设法以使得保护区更有吸引力，但发展地方经济的动力远大于保护环境动力。无论如何，不管各方的动机是多么的不同、也不管各自的出发点是什么，参与各方都想在天鹅洲自然保护区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解决人豚渔业资源之争，保护区管理当局一方面开始将新鲜江水引入长江故道、藉以丰富故道内的水资源并增加水生生物种群，另一方面则将渔民迁出保护区外以减少对有限渔业资源的压力。其他困扰保护区多年的问题如土地所有权之争、财政不足也因各级政府的多方努力而得到妥善解决。

可以肯定，由于各级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巨大努力，天鹅洲保护区在保护濒危麋鹿及繁殖江豚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出色。早在 2008 年其麋鹿已超过 1000 头，使其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野生麋鹿种群（简报 2008，1：封二）。石首麋鹿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及野生麋鹿种群的增加不仅有助于麋鹿回归自然，也为大型濒危动物成功回归自然并恢复种群提供了榜样。保护区的麋鹿保护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有人甚至将麋鹿的兴衰与中国国运的兴衰联系起来—当中国在清末衰弱、混乱之时麋鹿在中国灭绝，而今日中国崛起时麋鹿种群不仅恢复且不断壮大（郭耕 2005）。

不幸的是，保护区对濒临灭绝的白鱃豚的保护则未能达到其目的。生活在保护区故道水域内的惟一一头白鱃豚死于 1996 年，之后再也没有捕捉到白鱃豚并将其迁入保护区，主要是由于长江水质持续恶化及渔业资源减少。在 1997 年 11 月的一次科考中科学家们还发现白鱃豚 21 头次（王恺 2003：615），可在 2006 年的另一次多国联合科考中，科学家们未能发现一次白鱃豚的踪迹，调查者们悲观地认为此种在长江中生活了约二千万年的动物可能已经灭绝（王丁、王克雄 2008）。据一位芬兰籍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看法，多种原因—特别是人类因素—导致了这一可能的灭绝（Turvey 2009）。

不过保护区对江豚的保护则是成功的，其在长江故道内的头数已从 1992 年的 5 头增加到 2007 年的 32 头，且都生长良好。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鲸豚类动物迁地保护的成功事例（朱江 2005：75；石首旅游 2007，7：20）。到 2017 年，有约 80 头江豚生活在保护区水中，约每年增加十分之一（石首年鉴 2018：135）。2016 年底，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石首“中国江豚之乡”称号，显示国家对该保护区在保护江豚方面的卓越成绩的承认。

随着湿地保护呼声的不断加强，当地政府又加上湿地保护的内容并成功从上级政府申请到大量经费；并正以观赏麋鹿、湿地生态为名大力推介天鹅洲生态旅游。有理由认为保护区的未来看起来大有希望。

保护区管理当局这种以政府为中心解决问题的中国方式可能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那些地方选举或民主讨论可能会在做决定及筹款方面起更重要的作用。但上述天鹅洲保护区保护麋鹿与江豚的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在人口密集、资源有限的农村地区在近三十年时间内做到的。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历史不长，且“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仍是一项令人气馁的任务”（Li 2007：96），但所取得的某些成绩亦令人鼓舞（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对大熊猫的保护）。

结论

成立天鹅洲保护区是为了保护麋鹿与白鱃豚（以及江豚），但地方政府明显有自己的打算，其生态旅游的主旨即在利用麋鹿吸引游客，从而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最近石首政府与其上级政府荆州市政府都将天鹅洲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发展作为其核心经济战略之一。从依靠天鹅洲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争取投资及上级经费支持来看，石首政府目前为止做得相当成功。保护区的经济前景看起来不错。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近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造成了广泛的环境破坏，并导致大量的负面后果，包括白鱃豚在长江中的可能灭绝。但天鹅洲保护区对麋鹿与江豚的成功保护显示中国各级政

府同时也做了努力、并正在努力保护环境。一项新的研究揭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变得更绿了，而中国（主要靠多栽树）则是这一变化趋势的主要贡献者（Tabor 2019）。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依循不同于西方发展的模式，中国创造了一个无可争议的经济奇迹。随着中国国内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这曾经让有些人希望“中国也能创造一个环境奇迹、并为其他国家达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树立一个好的典范”（Liu and Diamond 2005: 1186），人们可以期望中国各级政府在其独特的社会政治体制下将会继续为保护湿地、保护环境做出特殊的贡献。

参考文献：

An, Shuqing, Harbin Li, Baohua Guan, Changfang Zhou, Zhongsheng Wang, Zifa Deng, Yingbiao Zhi, Yuhong Liu, Chi Xu, Shubo Fang, Jinhui Jiang, and Hongli Li (2007) “China’s natural wetlands: past problems,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challenges.” *Ambio* 36, 4: 335-42.

Li, Peter J. (2007) “Enforcing wildlife protection in China: the legislative and political solutions.” *China Information* 21, 1: 71-107.

Liu, Jianguo, and Jared Diamond (2005) “China’s environ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 how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ffect each other.” *Nature* 435: 1179-86.

Shapiro, Judith (2001)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bor, Abby (2019) “China and India lead the way in greening.” Earth Observatory (NASA). <https://earthobservatory.nasa.gov/images/144540/china-and-india-lead-the-way-in-greening> (based on Chen et al., “China and India lead in greening of the world through land-use management,” *Nature Sustainability* 2: 122–29).

Turvey, Samuel (2009) *Witness to Extinction: How We Failed to Save the Yangtze River Dolph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曹克清编著（2005）：《麋鹿研究》。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陈勇（2007）“石首为麋鹿腾出活动空间 保护区内意杨树开始清理”。《湖北日报》，5月2日。 <http://hubei.news.163.com/07/0520/02/3ETF2P4N0054007G.html>.

陈勇、朱江(2006) “为江豚让生存空间 天鹅洲渔民上岸当农民”。《湖北日报》，1月16日。 <http://www.cnhubei.com/200601/ca979632.htm>.

戴居华(1997)：“麋鹿缘。”《荆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172-91页。

丁玉华(2004)：《中国麋鹿研究》。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郭耕(2005)：“麋鹿与国运—国家兴，才有麋鹿兴”。收入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编：《跨过灭绝边缘的麋鹿》。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第3-5页。

- 《湖北水利志》（2000）。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 《简报》（2008）第一期，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 《荆州市志（1994-2005）》（2015）。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 李小云、左停、靳乐山主编（2006）：《共管：从冲突走向合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石首旅游》，《湖北画报》（2007）第7期。
- 《石首市志（1986-2005）》（2014）。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 《石首年鉴2017》（2018）。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 王丁、王克雄（2008）：《远逝的长江女神——搜寻最后的白鱀豚》。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 王恺主编（2003）：《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 吴学军（2005）：“湖北天鹅洲湿地保护之困：人与自然争夺生存权”。《新京报》，6月15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5-06-15/03376942695.shtml>
- 夏经世（2005）：“野生麋鹿减少的原因”。收入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编：《跨过灭绝边缘的麋鹿》。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第16-17页。
- 晓立、张利、姜晓晓（2014）：“湿地精灵的守护者——记石首麋鹿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李鹏飞”。《政策》第8期，第69-73页。
- 新京报（2004）“湘江相连 天鹅洲的希望”。7月1号。
<http://www.cnhubei.com/200512/ca970826.htm>.
- 佚名（2006a）：“长江科考过半：未见白豚 鲜见江豚”。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6/1204/00/7579_281848.shtml.
- 佚名（2006b）：“钟鸣强调天鹅洲旅游发展要振奋精神，坚定信心，拓宽思路，扎实工作”。
<http://tieba.baidu.com/f?kz=111489799>.
- 张家炎（2016）：《克服灾难：华中地区的环境变迁与农民应对，1736-1949》。北京：法律出版社。
- 张孺海、陈勇（2006）：“关注天鹅洲”。《湖北日报》，1月6号。
<http://www.cnhubei.com/200601/ca970674.htm>.
- 朱江（2005）：《江汉平原湖泊湿地近代环境变迁：以涨渡湖、天鹅洲长江故道为例》。中国地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